

辨異與認同： 20 世紀中期台灣女作家的旅行文學*

張毓如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xtine524@hotmail.com

摘 要

當前學界對 20 世紀中期台灣記遊文學的學術討論頗為有限，且多半是透過現代散文研究的框架進行考察，本文嘗試另闢蹊徑，引用晚近新生成的「旅行文學」概念，重探半世紀前三位女作家域外見聞的文學再現。首先，本文藉由西方理論對「旅行」內在結構的觀察，商榷「旅行文學」概念的適用問題，另一方面也論證三位女作家記遊作品的長處就在於對旅行結構本質的體察、描寫與再現。接著，本文第三節探討旅行及其書寫再現之於 1950、1960 年代台灣社會有何意涵，除了揭露特定民族、性別、意識形態立場如何影響了文學內容及其表現方式，也分析女作家如何在旅行文學文本中開闢相對自主的言說與批判空間。其後，為了探究女作家何以能在旅行文學上有所開創，本文第四節從現代女性旅行敘事的特徵來說明，女性作者書寫旅行經驗時經常訴諸的文學技巧，其實是旅行方式、性別處境、文化位置等因素交織下所促生的文本共相。綜合上述三個層次的探討，本文主張：在知性的滿足與文字美學的品賞之外，「辨『異』與認『同』」實乃 20 世紀中期台灣女作家域外書寫的一項重要核心價值。

關鍵字：旅行文學、認同、王琰如、徐鍾珮、鍾梅音

◎ 收稿日期：2015 年 10 月 31 日；審查通過日期：2016 年 1 月 14 日。

* 本文初稿原題〈她從海外來：以徐鍾珮《多少英倫舊事》、鍾梅音《海天遊蹤》、王琰如《我在利比亞》論 50、60 年代台灣女性文學的旅行敘事〉，宣讀於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的「第 11 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2012.05.26-27），承蒙會議評論人戴華萱教授及在場諸位學者先進惠賜寶貴意見，以及《台灣學誌》匿名審查委員的悉心審閱，在此謹致謝忱。

一、前言

相較於當代台灣旅行文學及相關研究在 1990 年代的興盛發展，20 世紀中期的台灣旅行文學激起的學術關注仍頗為有限，¹此一短少的現象極易被歸咎於戰後台灣社會特殊的戒嚴文化：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文學受到呼應現實政治所需的官方文學觀所主導，致使文學作品對「遠方」的想像往往投射在彼岸的神州故土，而非實際距離可能更遙遠的異國，因此就作品的數量而言，反共懷鄉的散文遠遠多過再現域外旅行經驗的遊記——可是究其實，文學的影響力與作品數量多寡並不高度相關，蓬勃的作品出版亦不是內容質量的保證，回顧 20 世紀中期的台灣文壇，即使旅行文學只占當時文學版圖上的少數，但透過相關作品在反共語境下所激起的熱烈回應，仍可見得它們深具文化指標的意義。

那麼，台灣旅行文學的研究為何相對忽略了 20 世紀中期的作品呢？箇中關鍵可能就在當代台灣旅行文學崛起時的某些「初始設定」之中。根據學者的研究，「旅行文學」是 1990 年代在文壇和學界多重力量交互運作下的產物，此前也未曾出現過「旅行文學」這個名詞、及其所代表的文學現象與社會現象（蘇碩斌，2014：255-286）。換言之，若以 1990 年代熔鑄出的標準回頭衡量近半世紀前的旅行文學，光是其中深受主流政治話語引導的觀看角度，便足以使之輕易被劃為相對落後的作品，但是，如此進化論式的界分是否公平，自然有待商榷。即使不以當代眼光來評判戒嚴環境之下旅行文學的得失，而單純就散文文類發展流變觀之，無論 20 世紀中期的台灣旅行文學屬於現代散文脈絡下的一線支流，或者甚至可以上接傳統記遊散文的內在精神（張瑞芬，2007：21-84），文本本身出於特定文化背景而對旅行別有的一番認知與表述方式，仍亟待重新仔細爬梳。雖然作家之筆如何點染出或珍奇或瑰麗的風景、如何鋪陳懾人心魄的交流體驗與他方故事，向來是傳統批評方法藉以衡度旅行文學高下的通用量尺，不過，1950、1960 年代旅行文學縱然有其文字藝術、題材經營上的講究之處，若僅以美文筆法或新穎體驗將其定調，則無以見出這批旅行文學的內在特殊性。

¹ 有關 20 世紀中期台灣女作家域外見聞的書寫再現，學界尚無較為全面的專論。在為數有限的相關前行研究中，戰後第一個世代的遊記作品多半被置於現代散文的脈絡下予以考察，或是在特定作家作品論的研究中被提及，例如鄭明嫻（1993）、朱嘉雯（2003）、張瑞芬（2007）的研究，嚴格來說並非旅行文學的專門討論。至於阮桃園（2000）〈從憂傷到浪漫：現代台灣旅遊文學中的情懷轉折〉、陳室如（2003）〈出發與回歸的辯證：台灣現代旅行書寫研究（1949-2002）〉雖然以旅遊文學書寫為著眼點，但傾向將 1950、1960 年代的遊記標誌為旅行文學文類發展上較為初步、未臻成熟的階段，藉以對照出 1980、1990 年代台灣旅行文學的躍進。

有鑒於此，本文必須先探討 20 世紀中期在台灣出版、流通的域外遊記，是否也可以稱之為「旅行文學」、也可以用「旅行」的概念加以詮解——尤其當「旅行文學」一詞作為當代台灣文學研究上別具特定文學文化現象的專稱時，研究者更要謹慎辨析，當代發展的批評思維裡，哪些部分不適合藉以討論 20 世紀中期的文學現象、哪些部分仍可以對不同時空的文學有所啟發。故而，本文第二節透過西方理論對「旅行」內在結構的觀察，要指出 20 世紀中期台灣的旅行文學由於著重描寫旅遊地與家之間的各種異同，明顯反映出從事旅行的主體最常發生的心理變化，所以，這些作品在文字美學與造境上容或繼承了傳統記遊散文的韻致，然而其長處就在於對旅行結構本質的體察、描寫與再現。接著，本文第三節企圖透過文學文本重新探討旅行及其書寫再現之於 1950、1960 年代台灣社會有何意涵，思索個別女作家的域外經驗如何持續、動態地移易文學與文化生產的樣貌，除了揭露特定民族、性別、意識形態立場如何影響了文學內容及其表現方式，也聚焦戰後第一代女作家的旅行文學文本，分析她們如何在參與沸騰不已的反共聲浪的同時，透過性別身分、發聲位置而開闢相對自主的言說與批判空間。最後，為了探究女作家何以能在旅行文學上有所開創，本文第四節從現代女性旅行敘事的特徵來說明，女性作者書寫旅行經驗時經常訴諸的文學技巧，一方面可能出自作家個人獨有的情思與稟賦，一方面還更是旅行方式、性別處境、文化位置等因素交織下所促生的文本共相。總之，藉著論證當時女性旅行文學的特徵和重要性，本文嘗試發展出更加符合文本時代背景的詮釋路徑，以開拓台灣旅行文學研究的涵蓋範圍。

應當補充說明的是，本文論題「20 世紀中期台灣女作家的旅行文學」看似論域廣泛，實際上可資討論的作品卻相當有限。在出入境受嚴格管制的時代裡，大批女作家之中也僅少數人曾經出國旅行，遊畢歸來著書出版者，更是屈指可數。再就作品的影響層面而論，只有徐鍾珮的《多少英倫舊事》和鍾梅音的《海天遊蹤》洛陽紙貴，成為暢銷經典，²至於王琰如旅居非洲所寫的《我在利比亞》在題材與表現上與前述兩部作品有許多疊合或相似之處，故而擇取作為本文的研究案例。

² 本研究以三位女作家的旅行文學為研究對象，卻未論及徐鍾珮《追憶西班牙》（1976）、王琰如《旅非隨筆》（1972）、鍾梅音《旅人的故事》（1973），乃是因為這三部作品的成書年代不適合藉以討論 1950、1960 年代的旅行敘事和域外想像。再者，《追憶西班牙》描寫宮殿、教堂、博物館、皇室故事以記敘西班牙歷史，幾乎等於異國史話，少有旅人自身的觀察或發想。《旅非隨筆》介紹利比亞上千年的歷史和該地的地理環境人文風土、在歐美英法各國遊覽的紀錄，而且該書後半部多是自述、憶舊、懷友，不純是旅行文學。至於林海音《作客美國》出版於 1966 年，雖符合本研究的時代範圍，但因為該書屬於在美文化界人士的訪問記，偏重記述新朋舊友的旅外近況與動態，故不納入本研究的範疇。另外，謝冰瑩《菲島記遊》（1957）固然可以看作遊記，但這些文字其實只是謝冰瑩蒐集小說寫作資料之行的初步紀錄。蘇雪林《歐游獵勝》（1961）雖然是旅行文學，但與本文聚焦的三位女作家相比，旅行文學並不是蘇雪林主要經營或藉以揚名的文類，故而在選材上有所取舍。另外，由於本文討論的是主要活躍於 1950、1960 年代的「戰後第一代女作家」，但本文論及的部分作品寫於 1940 年代、透過戰後遷台再版而暢銷了數十年，所以將討論的目標年代設定在較為寬泛的「20 世紀中期」。

二、異國和本邦的交互映現

旅行文學在 20 世紀中期的台灣文壇雖非主流，³但徐鍾珮、鍾梅音記敘海外旅行見聞的作品的風靡程度，連高度市場化的當代台灣旅行文學恐怕也無法望其項背。1954 年，徐鍾珮的散文集《英倫歸來》在台灣再版，這部書是徐鍾珮由《中央日報》倫敦特派員一職返國之後寫下的隨感，1948 年在南京首度出版時，創下上市不到一個月旋即售罄再版的紀錄，隨之而來熱烈的讀者迴響亦奠定徐鍾珮的新聞專業形象與文壇盛名（〈「英倫歸來」再版自序〉；徐鍾珮，1985：7-8）。爾後，《英倫歸來》和「倫敦與我」等駐英期間的新聞通訊稿、專欄隨筆結集為《多少英倫舊事》一書，於 1964 年在台灣出版，1977、1985、1987、1989 年陸續由不同出版公司多次再版，坊間還曾出現盜印版本，由此足見英倫系列的暢銷與長銷。⁴就在《多少英倫舊事》面世的 1964 年，散文家鍾梅音隨任職台灣肥料公司的夫婿出國進行業務考察，80 天的旅程中遊歷了亞、歐、美各洲 13 個國家、25 座城市，返國後，鍾梅音陸續在報端發表遊記，同樣廣受各界讀者喜愛，來函紛至。1966 年，鍾梅音將上述文章結集出版成 25 萬字、分為上下兩冊的《海天遊蹤》，這套由名家設計封面的遊記，版式獨特並附有彩色照片插圖，在當時的出版品間頗為清新出眾，甫一推出便躋身書市寵兒之列，一版再版，膾炙人口（〈序〉、〈再版後記〉；鍾梅音，1966a：1-6，240-244）。對於戒嚴時期受政治、經濟條件等限制而不能自由出境的多數台灣人而言，旅行文學所展示的域外見聞和新奇事物不僅提供高度的閱讀樂趣，也是形塑「外國」概念與知識的重要來源。藉著這些暢銷旅行文學所展示的異國景物、生活風俗、社會制度，以及融會了旅行者和創作者個人學養與觀察的所思所感，我們得以一窺當時台灣社會的域外想像。可惜的是，1950、1960 年代的旅行文學往往因其知識性、新奇感受到矚目，卻也往往就此獲得文學史定位，從而封閉了其他評價的可能。

雖然旅行文學、旅行理論的興起，使得「旅行」成為當代台灣重要的文化現象與文化關鍵詞之一，不過，當代定義下的「旅行」（譬如：必須建立在個體的行動自由和經濟獨立、社會風氣的寬容開放等客觀基礎上）不免模糊了我們對 1950、1960 年代旅行文學的觀察，誤以為這些文本總是複寫主流意識型態、強化既有的僵固體系、較缺乏多元開闊的視野。嚴格來說，旅遊活動的普及固然是引發當代旅行書寫熱潮的一項背景因素，

³ 1950、1960 年代台灣的旅行文學作品除了為數有限的海外遊記之外，許多戰後遷台的文人也曾寫作台灣各地的遊記，例如錢歌川《三台遊賞錄》（1953）、伍稼青《台島攬勝》（1955）、程兆熊《台灣山地紀行》（1956）、朱介凡《台灣紀遊》（1961）等等，然而，無論是遊覽的方式和內容、作品的主題意識、藝術構成以及影響層面等，與本文的核心關懷均有所出入，宜另闢專文再行討論。

⁴ 徐鍾珮《多少英倫舊事》的各個版本年代與出版社分別為：1964 年文星書店、1977 年大林書店、1985 年時報出版公司、1987 年水牛出版社、1989 年水牛出版社。

但是，旅行文學的產生不必然與旅遊實踐的盛衰畫上等號，現實環境有多大程度促進或抑制旅行活動的發生，與旅行文學的界定、旅行文學文本的研究實屬不同層次的課題。研究者自然必須留意：戒嚴時期的旅行寫作者據有社會、經濟、話語權上的優勢，然而，當代的旅行寫作者其實也是另一個力場結構下享有發聲權的勝者。換言之，爲了更加理解 1950、1960 年代的旅行文學，與其就場域位置來評斷寫作者們的「見」與「不見」，本文更期望在文本的層面上討論旅行經驗和域外印象如何被呈現和建構，因此，下面將借助旅行敘事學者的分析，從旅行的基本結構去審視相應的文學文本特徵。

旅行敘事的研究者范登阿比利（Georges Van Den Abbeele）在〈旅行經濟學〉一文探討「旅行」（travel / voyage）的隱喻及其哲學意涵時，強調「家」之於旅行結構的重要性：在異地遊歷固然是旅行裡與未知事物相互激盪碰撞的重要過程，但「家」作爲旅行據以出發和歸返的端點，它所代表的意義絕非乍看之下那般穩定而透明。⁵范登阿比利闡釋「家」在旅行結構裡必定位於「旅人踏上旅程時所離開的時空」，以及「旅人在途中所期望返回的時空」這樣的關係性位置當中，縱然「家」的內涵會隨著旅行經驗而發生轉變，旅人啓程揮別的「家」和遊畢歸返的「家」因此不可能完全相同，但無論如何，「家」在旅行結構中的位置無非意味著：「家」只有在旅人離開它時，才成其爲「家」。更進一步說，既然「家」的概念只能成立在對「家」的遠離或失落（也就是「不在家」的狀態）之中，那麼，文本中「家」的存有其實就說明了「旅行」的已然發生（Van Den Abbeele, 1991）。

范登阿比利對旅行與家的關係辨證，適足以爲旅行文學的定義問題提出不同的思考角度，據此，20 世紀中期台灣旅行文學裡處處可見的「家」也說明了「旅行」無疑是解讀相關文本的關鍵概念；當然這裡所謂的「家」不僅是狹義的個人家庭歸屬，同時還廣義地指涉旅行者的原生環境及母國文化。檢視 20 世紀中期的台灣旅行文學，其字裡行間對家國社會的念茲在茲，一方面出於該世代知識分子血液中沸騰的愛國意識；另一方面，誠如拉岡（Jacques Lacan）鏡像理論所提示的，主體概念的形成是源於辨識他者與自身的對立（Lacan, 1949），也就是說，海外遊記描繪、傳遞異國風物與印象的同時，也不斷反身定義著台灣人對自己的認知。於是乎，文本中交錯映現的異國事物與本邦情狀正說明了作家對旅行結構有何覺察——比起當代台灣旅行文學幾乎無感於旅途起點及終點之

⁵ 所謂「旅行經濟學」（the economy of travel），是一種看待和定義「旅行」的取徑，它從旅行活動的得失損益來衡量與思考「旅行」之涵義與結構，一如經濟活動的邏輯，因此以“economy”名之。根據旅行經濟學的概念，旅行者在旅途往返之中進行實質或象徵資產的交換，爲了符合經濟與成本效益，則必須設下旅行的歸著點——通常就是旅行者的「家」，於是，此一概念指出了旅行的基本結構是由「離家」與「返家」兩段相繼的旅途組成。本文則援引旅行經濟學對旅行結構的觀察，考辨分析旅行文學敘事對旅行活動的再現（胡錦媛，2000：182-185；Van Den Abbeele, 1991: xiii-xxx）。

間的差異，⁶1950、1960 年代的記遊散文對旅行結構本質的再現是較為完整的，他們顯然是拎緊了名為「自我」的行李、甚至帶著自己的「家」而遊歷天涯。

戒嚴時期的旅行文學除了作為一扇向國內讀者展示外面世界的窗口，尚且反映了許多層次的「在地」思維，包括了：自 1950 年代起被編入世界冷戰體系以來，台灣社會集體意識中以民族思想為核心而逐漸高漲的崇美情緒，以及對歐美資本主義現代論述的服膺與追求。以《海天遊蹤》為例，鍾梅音的旅行足跡雖遍及亞、歐、美 13 個國家，但有關美國的文章幾乎占全書四分之一篇幅，文本所認識或建構的「西方」版圖，其地理範疇是以美、英、法等歐美大國為中心，旅行者的觀察和敘述也透露出極為親美的態度（〈序〉；鍾梅音，1966：1-6）。再者，這些旅行散文與時下思潮最顯而易見的呼應，便是對西方器物制度的贊揚與接受，以及知識分子欲借鑑歐美經驗來謀求改進國內積弊的滿腔熱忱。譬如《海天遊蹤》提到美國社會落實民主與法治精神、西歐國家的精良工業和創意設計；徐鍾珮《英倫歸來》寫戰後英國民生凋敝但全國上下力圖振作，文本中俯拾皆是對歐美進步之處的企羨和推崇，並展現憂國憂民的深切情懷。另外一類不來自「文明世界」的例子，則是女作家王琰如的利比亞經驗。作為協助友邦進行基礎建設的駐外工程人員眷屬，王琰如藉著《我在利比亞》傳敘描寫了非洲國家在觀念、制度、生活上的相對落後。雖然她筆下挾文明以自重的優越與自信是其他同時代旅行散文中少見的，但究其道理，同樣不脫富強論述的邏輯。

由是，本文討論的這些作品，無論是戰前的初版或戰後在不同時空下的再版，也不論作者聚焦書寫的是哪些特定環境的異國，在通篇講述域外事物和陌生情景的文本表徵下，其實或隱或顯地指向某種理想自我的認同。對這些旅行者兼書寫者而言，「域外」是作為藉以觀看和辨識的客體，因此，書寫「域外」的旅行文學，其實正是「由測繪域外形狀以投射出理想自我」此一過程的文本示現。例如《海天遊蹤》裡，只見作者留連歐美各國的名勝古蹟、花園、街道與餐廳，滿眼異國情調的建築、風景或生活方式，然而字裡行間洩露的，無不是中國文化面對山水、歷史而特有的古典情懷與詩意聯想，以及自覺生於泱泱古國而充溢胸中的民族榮譽感。《多少英倫舊事》談論英國的民生物資配給、倫敦菜市場的人情往來、城市景觀和鄉村風物等，雖然寫的是作者在英國的經歷，

⁶ 根據胡錦媛的研究，當代台灣旅行文學寫作者並不敏於指出旅行出發點與回歸點之間的差異，亦即，在「出發、遊歷、歸返」的旅行結構中，這些作家的筆往往在離開異地返抵國門之際便戛然而止，旅行經驗是否影響旅人對自我和家鄉的認識、旅途伊始所跨出的「家」與後來返回的「家」有何不同、旅人又是如何面對其間的差異，作品裡鮮少提及。相對地，本文發現 1950、1960 年代台灣旅行文學除了記述域外遊覽經歷，文本不時反身回看台灣社會的種種情狀，甚或重新定位個人在國族、性別、文化等主流論述下的位置，而正是這些特色，使得 20 世紀中期台灣女作家旅行文學與後來 1980、1990 年代旅行文學有所不同。有關當代台灣旅行文學的結構特徵，參考胡錦媛（2013：43-74）。另外，此處所謂「返鄉敘事」（“Return-home” Narrative）指涉旅行文學對於旅行結構當中「歸返」這個部分的文學再現，若僅由中文詞面意義來理解，容易與解嚴後台灣社會的大陸返鄉熱潮所催生的「返鄉文學」、「探親文學」有所混淆，故而補充說明之。

但結尾處經常將筆鋒反轉，或思考中國現狀之優劣，或追尋民族未來之前途。《我在利比亞》即使再現的是現代化程度不如台灣的沙漠國度，偶爾遇有利比亞較為高明之處，作者更是熱切地希望引介回台灣社會。這些旅行文本對「家」的重視著墨，可見一斑。尤有甚者，作品中輾轉折射自我認同的文本跡象，還提醒我們不可輕忽，如此多重繁複的過程並非「崇洋媚外」這般本位主義式的批判即可概括。本文以為，描寫異文化相接觸時觀看視線的複雜運作，並將「與他者相遇而一再鎖定、辨識或否認，直到自我得以形構」的過程透明化，才是這批旅行文學真正寶貴之處，其中對國內文化和時事的深度省思和批判並不見得少於當代旅行文學，針對相關面向，下一節將有更進一步的分析。

在文本內涵之外，作品流通的軌跡也為這些旅行散文對域外與國內的參照觀察，提供了另一向度的證明。根據前述徐鍾珮《英倫歸來》、《多少英倫舊事》的出版歷程顯示，英倫系列散文自從 1940 年代末首次在南京登場以來，其後在台灣 1950 到 1980 年代有多次編排再版的紀錄。寫於二戰方結束不久的《英倫歸來》既已在南京出版，何以在徐鍾珮渡海來台 6 年之後，又要再版這批有關戰後英國社會實況及歐洲局勢觀察的報導呢？尤其「時效性」乃新聞的要素，英倫系列在報導的時效性消滅之後，四十年來仍多次在台灣再版，箇中原因頗為耐人尋味。誠然，徐鍾珮作品的文學感、美學造境是使英倫系列散文歷久不墜的原因之一，但戰後台灣社會主導文化則更是支持這類文學敘事得以盛行的深層結構：《英倫歸來》的 15 篇散文藉著說明戰後初期英國的內政措施、介紹英國的皇室、勾勒戰後歐洲國際情勢等，反省世局動盪下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端與文化上的落伍之處，而正是字裡行間流露的沈痛感慨和懇切呼告，與戒嚴時期台灣社會講求勵精圖治以謀反共大業、以及戮力邁向現代工商社會的時代氛圍一拍即合，才使得英倫系列散文能在「戰前南京」以至「戰後台灣」前後不同的時空背景下依然激起高度的共鳴。

簡言之，正是因為這批反共氛圍下的記遊散文展示了旅途中與他者的種種遭逢邂逅，且呈現出旅人如何透過越界（transgression）與調和（mediation）的作用，在一邊開拓視野的同時，持續反思、重構他們心目中「家」的面貌，顯出旅行文學作者對「自我」（包括個人與集體層面）的敏銳感知，從而在複寫反共、懷鄉的政治意識形態同時，顯露出翻盤改寫異國形狀以與主流社會進行深層辨證與協商的可能。

三、流動的認同與批判

「出發、遊歷、歸返」是旅行的基本結構，旅人在其中不斷遭遇他者、持續與之磋商辨證，旅人的主體認同亦從而被建構或反覆調整。上一節藉由旅行的結構，考察了戒嚴時期旅行散文的內在特色，本節則著重探討戰後第一代女作家的旅行敘事和域外想像

開啓什麼樣的批判空間？呈現哪些與主流文化商榷的可能？這些文學如何與主導文化同聲唱和？又或者保持微妙距離地提供他途知識？

有關旅行跨界與主體位置流動（或不流動）的課題，廖炳惠曾以旅行的科技範疇、情感結構、心理機制等三大基本面向的流通與作用，討論台灣文學中移動經驗與記憶認同的塑造和轉化。其中所揭示的心理符號機制涉及了「差異、再現、批判、調整、認同」等相互株連牽扯的層面，也指出旅行過程經歷的景觀和文化差異顯示旅行者自我與他人的差別，從而使旅行者對我關係產生新的認知。此外，旅途中與他者相遇的經驗促使旅行者自我反思、進而發展對自身文化的批判，同時做出調整以重新尋找認同、定義自我（廖炳惠，2002：84-91）。分析徐鍾珮、鍾梅音、王琰如三位女作家的旅行敘事時，上述機制可以引導我們關注旅行之中的差別體驗與隨之而來的新奇感受，此外，多元的文化觀、文化批判的立場更是在與諸多他者的遇合當中匯集形成的。譬如前行論者曾指出《海天遊蹤》不時顯露對台灣社會「恨鐵不成鋼」的心情，類似的喟嘆與觀察也是同時代旅行文學的一大特點（阮桃園，2000），這些文本徵象顯然來自當時知識分子的社會關懷，但是本文更要補充，在 1950 年代以抒情美文見長、並不專務雜文寫作的鍾梅音，到了 1960 年代能夠以旅行散文交出不同於以往的創作成績，開發作品中議論與說理的面向，不能不說正是旅行裡頻繁遭遇各種文化他者而對主體心靈和文學表述產生實質影響的最佳例證。

值得注意的是，旅行文學文本對域外事物的觀看與展示並非自然天成，即使作者採用的是虛構性較小說為低的散文文類，一樣需要透過美學手法的經營與安排，方能達成整體的文學再現。於是，當女作家善用「正言若反」的技巧，藉旅行散文表達對國家民族的期望與對社會時事的評論，因而獲得「敏於直言時弊」的稱許時（張瑞芬，2007：134-136），我以為研究者必須留意到，文本字面上實際可見的批評——也就是旅行敘事展演的第一度批判空間，其實仍屬最為直觀的層次。譬如鍾梅音提到新加坡政府「興建廉價住宅的卓越表現與高度效率，真教台灣國民住宅的承辦人愧死」，並藉友人之口暗諷台灣社會的反攻事業只流於口號，應當向刻苦實幹、熱愛祖國的新加坡華僑看齊（〈星馬行腳〉；鍾梅音，1966：213-220）；或是王琰如從海外華僑子弟在籃球場上遜人一籌的經驗說起，呼籲國內主婦要多在飲食、營養方面調教下一代，方能「在世界上和其他民族爭勝」（〈海外觀球有感〉；王琰如，1969：172-176），凡此種種建言，皆是記遊散文所明確負載的社會批評，然而歸根究底，此類批評仍服膺於主流政治話語，其中所蘊含的顛覆意識實則相當有限。

旅行敘事所刻畫的作者胸中丘壑，顯然不僅止於此。旅行活動心理機制的「差異」一方面繫之於辨認出自身文化和異文化彼此之間的不同，另一方面體現在將異文化對

「自我」(從事旅行的主體)的東方主義式觀看予以否認的過程之中——後者可以說是一種向外的批判，是意識到自身遭到他者化因而產生的抗拒。證諸文本，徐鍾珮的英倫系列頻頻就此發出不平之鳴，其中要數〈沒有剪掉的辮子〉最具代表性。這篇文章洋洋灑灑列舉英國人眼裡的刻板中國形象：男人留辮子、女人梳髻又纏足、中國人個個都是鴉片鬼、而在歐美的華人全都經營洗衣作坊或中國餐館，尤有甚者，「外國人認為中國人還善於魔術。著名馬戲團裡，常有若干中國人參加。東方本身是謎，謎裡的人物，自然的會些魔術。戰前一位英國魔術家，為號召觀眾，竟改成中國姓字，假充中國人。」(〈沒有剪掉的辮子〉；徐鍾珮，1985：54)

徐鍾珮還描述英國人對瓷器、絲綢、繡花、字畫、翠玉等中國藝品的盲目愛好，藉機以幽默的筆法暗暗批評英國人對東方文化所知淺薄卻喜愛賣弄，譬如某位英國老先生自傲於收藏了一批中國古董花瓶，卻渾然不知那些花瓶上刻的方塊字其實是日文；又或是許多英國人每見到中國藝品上的題詩，便以為那是孔老夫子的大作，彷彿全中國的文人只有孔子一位。面對如許「洋相」百出的洋人們，徐鍾珮不禁感嘆在他們心目中，中國人的長辮子始終未曾剪斷。

一廂情願看待異文化的傾向，並不單方面存在於外國人對中國的凝視之中，旅行在外的主體也每每憑一己之見揣度路上相逢的異國景象和人物。以鍾梅音為例，她擅長化用古典詩詞的美感造境，描繪旅途中的景色、佳餚、人情、文物，浪漫婉轉的文字除了展現作者獨特的寫作風格，這種感性而富含詩意的文本造境隱約之間亦推動著敘事情節的發展：

從約瑟芬臥室的窗戶，可以一眼望見瑪爾梅莊的後園，三兩隻白鵝，幽靈一般徜徉在池塘中。滿院寂寞的海棠，紅得蒼白，淡得傷心，依稀是約瑟芬昨宵枕上的斑斑淚痕。當嚮導女郎頻頻促駕，我還癡癡地立在窗前。

我發現，我也哭了。(〈拿破崙與約瑟芬〉；鍾梅音，1966：203)

《海天遊蹤》充滿類似的抒情美文，與其說是情景交融、物我合一，其實更加證明了，旅行者的主體認同在悄然之間轉移到某種「中國古典的」、想像出來的異樣時空，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種往復辨認、消化、調整之中的自我概念。

旅行者「不裡不外／既裡又外」(in between)的觀察位置，加強這批記遊散文對現實政治和國際關係的針砭力道。例如1946年徐鍾珮以駐外記者的身分採訪巴黎和會，寫下一系列「巴黎會議旁聽記」的報導，著重對俄國代表莫洛托夫負面描寫以示反共立場

之際，冷然觀察二十多個與會國家代表各懷利益盤算，在會議內容或議程形式上合縱連橫、爭奪角力、彼此消耗，從而質疑所謂的和平論述，只是虛妄（〈巴黎會議旁聽記〉；徐鍾珮，1985：157-218）。此外，這些寫於 1950、1960 年代的文章，不無開啓解殖民的可能，一方面致力於撤除日不落國的帝國光環，強調戰後的英國社會問題叢生：

稅收下淨得了款項又有何用？人工奇缺，不能僕從如雲。自皇帝到庶民，同受糧食配給，不能美酒佳餚。大家同受著配給，不能鮮衣美服。請不到外匯去國外旅行考察，不能多長見聞。可憐，開闢殖民先鋒的東印度公司子孫，卻眼怔怔的關在英倫三島。（〈自由空氣〉；徐鍾珮，1985：16）

另一方面也有像王琰如這般的，訴諸切身的生活經驗以打破殖民主義式的刻板印象：

利國地大人稀，物產不豐，主要在於土質不肥。我初來時，以為他們農業不發達，或許是一般人民過於懶散。直到最近，才使我恍然大悟，原來看上去一大片一大片荒地，總覺棄之可惜。事實上，地下並非沃土，而是其堅如鐵的石塊。「不毛之地」來源如此，可謂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了。（〈好吃最是中國餐〉；王琰如，1969：150）

檢證女性旅行敘事中的認同轉折、指出其中真正具備政治顛覆潛力之處後，我們必須注意這些作品的文學手法特徵與女性意識的開拓。在性別權力關係的實踐中，女性往往被客體化、被當作凝視的對象，一旦女性踏出家門展開旅行，與他者的相互遭遇、彼此觀看就蘊含了掙脫原有客體位置的潛力，甚至得以激發其內在主體性的萌生。藉著這個概念的啓發，面對本文所討論的女作家記遊散文作品時，我們不能忽略「女性從事旅行並書寫旅行文學」的行動本身，就是一件新奇的事情。受到旅行種種機制影響而生發的女性主體會是游移的、持續在形構和變化過程中（in becoming）的，一方面相當程度地認同於原有的男性主體的觀看，一方面則透過接觸他者而有了辨認差異、重鑄認同的可能，這個新的認同因為異於原來所處時空環境，所以可能更具自覺地發動比較和批判，從而遠離原來社會、家庭所設下的性別限制，並且，上述主客體流動過程的軌跡，往往就存在於女性筆下的旅行文學敘事當中（Bassnett, 2002: 226）。求諸文本，徐鍾珮的英倫系列會是既貼切而耐人尋味的複雜例證。〈她們的腳大了一號〉以英國女性在戰後的平均鞋號要比戰前為大，一方面說明戰後英國物資缺乏、仰賴配給制度的民生窘境，一方面描寫英國主婦為張羅生活而四處排隊奔走，家務勞瘁之際依然把握時間讀報、聽廣播、看電影，而當她們走出廚房踏入社交場合時，還能維持衣履光鮮、談吐不俗，儼然十項全能的時代新女性。文末，作者卻以京滬列車上見到派頭時髦、氣燄高張斥喝丈夫和僕

役的中國太太作為對照，懸念著英國太太們竟不及中國婦女的「自由與解放」。這篇文章「西方與東方／英國與中國」的對照框架僅是最表面的一層，所謂「旅行使女性掙脫原來社會性別桎梏」的理論共識或許也只說對了一半，部分中國主婦縱有僕傭代勞家務，盤根錯節的社會經濟結構實在並未解除女性整體的受迫地位，更進一步說，徐鍾珮寄寓其中的深層批判無非超乎前述的表面對立框架，直指東西皆然的父權中心論述。不過，同樣身為女性，徐鍾珮對中外姊妹妹妹們的批評是相當含蓄而筆下留情的，諷喻、諧擬、幽默、正言反說等等，是她最常使用的敘事策略；在其他許多不見得涉及性別議題的文章裡，她也援引同樣的手法來展開複合式、多層次的批評。為了可以在內容上四平八穩地多面進擊，才是徐鍾珮散文敘事技巧往往倚賴反諷、幽默寫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不至全是源於某種作家個人稟賦或創作偏好。因此，下一節將聚焦在這些女作家旅行文學的敘事、文體層面的問題，試析現代的遠遊經驗觸動了哪些散文構造的新策略。

四、現代女性旅行文學的內容構造特徵

前述旅行文學文本呈現的人我關係與認同辨證，構成女作家旅行散文頗為獨特的文學體式和內容，既與同時代的女性小說大異其趣，又有別於其他不以記遊為旨趣的女性散文。以作家作品論為軸心的研究多半將文學裡的各種美學表現歸功於作家個人的情思與才氣，本節則試圖探索女性寫作者再現旅行經驗時，哪些文本特徵可能是女作家們普遍共有的，其生成的機制、個別的細部表現又是如何。因此，本節必須先回顧既有作家作品論中較具影響力的、關於性別因素與文體特色的討論——也就是評論徐鍾珮作品時常見的「中性文體」一說，分析其中隱藏的盲點，繼而，本文援引西方女性旅行文學研究的觀點，檢視三位女作家的旅行文學文本如何在表述方式、取材等方面反映和回應著現代的女性旅行經驗。

熟悉台灣戰後第一代女作家的研究者應該都了解，徐鍾珮的新聞專業背景是幫助她躍上文壇的一大資本，同時也是日後使她的文學表現與其他同輩作家截然不同的原因之一，⁷鄭明嫻據此指出，有別於 1950、1960 年代女作家筆下常見的唯美風格和閨秀氣息，「中性文體」是徐鍾珮的文學特色，具體而言，「明淨的語境、小說格局、重思維而少感性」是構成這種文體的幾個要素（鄭明嫻，1993：311-334）。然而本文以為，「中性」仍是個相當曖昧不明的評價詞彙。如果循著「閨秀作家文風綺麗、注重抒發細膩情思」的

⁷ 在此應當說明的是，本研究聚焦的三位女作家之所以能獲准出國、暫離戒嚴時期的封閉環境赴外遊歷，實與她們的職業和性別身分關係密切，但若由此即批判她們在文化場域中的菁英位置，不僅不能幫助我們釐清本研究的論題，同時仍然蹈襲文學史給予戰後外省作家的最普遍評價，因而較缺乏開創性，故本文不依循此一路徑立論。

認知，我們或可理解所謂「中性」是形容相對於上述美文路線、較偏向說理議論且節制辭藻的一種風格。可是，女作家經營說理散文，為何會被認為是「較有男子氣」、甚至因而將其文學的性別光譜地位挪移到「中性」的區塊？相反地，就一個喜愛抒情感懷、文風細膩纖柔的男作家而言，他的作品卻絕不會被歸類為「中性文體」，這又是為什麼呢？更加嚴重的是，上述評價邏輯其實暗中偷渡了『女性』等於『軟性』這樣的偏頗判斷，在意欲讚揚女作家的文學表現、提升其文學史地位的同時，卻無疑重蹈男性中心思考的覆轍。

在語文風格的層次上，「中性文體」的概念或許有助分辨不同類型的文學表述方式，然而其整體思維框架卻有違女性文學的基本立場，不適用於釐清本研究的主要論題。前一節曾經提到，女性從事旅行、撰寫旅行文學，具有徹底的「新」的意義與「解放」的潛能，因為在交通科技尚不發達的時期，旅行、探險所需的能力與經濟成本使得旅行只能是貴族男性的專利，換句話說，女性旅行文學文類本身其實已具備強烈的現代意涵。根據史密斯（Sidonie Smith）對 20 世紀女性旅行文學的研究，現代交通方式對女性文學敘事是有影響的：各種用於移動的載具組織了不同的旅程內容和敘事意向（*narrative intention*），從而引導作者採用特定或相應的敘事策略以再現個別的旅行經驗、以及由現代科技產生的「移動中的認同」（*identity in motion*）。所謂「移動中的認同」是相對於只能固守一處（通常是部落或家庭）、無法遠行的傳統女性而論的，當女性旅行者兼女作家標誌出她行經的土地、景觀、語言、人群的位置之際，她同時也將自己定位為移動中的主體，於是乎，此一主體恆常處在不斷重新定位、自我檢閱的過程之中。更進一步，也就是在這種新式的主體形構和文學敘事裡，女作家得以針對旅行內部的男性邏輯展開質疑、對話與協商（Smith, 2001）。細繹 20 世紀中期台灣女作家的旅行文學，讀者不難見到她們隨著與原居地遠離，對原先的世界觀、對固有文化的認知逐漸有所鬆動或改變，批評的空間也由此孕生。譬如徐鍾珮記敘從倫敦搭機返回中國的途中，「到緬甸京城仰光時正是日中，熱得人坐立不安，我應該是其中最熱的一個，因為放在我前面的一份緬甸英文報，上面正大字標著：『中國要我們的北緬甸。』」（〈一口氣竄過七個國家〉；徐鍾珮，1985：8）雖然只是旅行中的短暫片刻，也並未發生任何人際互動，但赫然在目的報紙標題直刺著旅人的國家意識，長久以來心念所繫的祖國在鄰國眼裡，原來是一副虎視眈眈的侵略者面貌。作者沒有提出任何直接的議論，然而光是被那輕筆帶過的、如坐針氈的臨場感受，便已說明此中可能有著無數幽微的轉折。又如鍾梅音藉美國之行順道探望弟弟一家人，她旁觀擁有洋碩士學位的弟媳「委屈地在家裡做保姆兼管家婦」，辛苦照料家務與一雙年幼的女兒，還要背負夫家寄予的生子期待，因此鍾梅音格外同情弟媳，甚且表示「男孩女孩一樣」來挑戰傳統觀念：

「姊姊，我實在吃不消了，我不要再生孩子了，可是鍾不同意。」

「我同意。」我說，「男孩女孩一樣，……。」

雖然依照舊式禮法，我無權說這話，但母親既不在面前，他們把我當做尊長，我也只有「見機說話」。(〈探親記〉；鍾梅音，1966：93)

不過，這則文本例證的精彩之處還更在後頭：

可是在飛機上，我又收回了對雍容的諾言，心裡默禱著：但願再見時，又有個詹姆斯或愛迪生什麼的讓我抱抱，我自己也說不出，為什麼我是這樣喜歡嬰兒，特別因為是我弟弟的兒女？(〈探親記〉；鍾梅音，1966：96-97)

前後兩樣的立場充分反映出：旅行體驗不斷地向既有主體發出探測與質問，而且這會是一個變動不居、持續變化中的過程。在親眼見到弟媳的為難處境後，作者相應地激發出更具女性意識、講求女性個人自我實現的性別概念與家庭觀，別後卻又有所動搖，反而挪移到較為傳統保守的一端。但讀者切莫立馬代入操作女性文學評論時的典型公式，以為「較不具女性意識的就是不好的」，本文完全不認為女作家此處呈現的觀念轉折應該遭受指責——尤其對於文本所持的性別意識，應當要置於更多層次的辨析始能確認。引述這樣一則描寫旅行時主體游動於不同價值取向間の文本例證，目的是要強調，女性旅行敘事對「移動中的認同」的精準捕捉與再現，莫過於此。

另一方面，女性旅行文學敘事還具有其他許多可以具體指認の文本特徵。巴斯內特 (Susan Bassnett) 曾經研究性別和旅行文學的關係，指出旅行敘事構造在 20 世紀的最顯著轉變，乃是對話體的廣泛應用，以及小說化、自我虛構化的傾向，雖然這些文學特徵並不具性別屬性，經常是男女作家皆然，但兩者之間仍有一些可資分辨的差異。一般而言，男性旅行敘事多寫崇高的事物和景象，表露大敘事式的觀點，有別於此，女性旅行敘事的特徵則在於：引進大量的日常生活細節、著重描寫人際往來關係。簡言之，兩性的旅行文學是在「選材、偏重、旅行者和預設讀者間的關係」三方面有所區別的 (Bassnett, 2002)。檢視本文的研究對象，就對話體的運用和自我虛構化的傾向而論，王琰如《我在利比亞》雖不仰仗對話來展開敘述，但她的作品敏銳地再現了異邦人之間對語言隔閡的察覺以及克服的過程，而語言也正是所有跨文化交流幾乎都要面對的基本課題：

當我們到他的店裡去購買文具時，向他說：「沙拉姆阿李孔」(哈囉) 或「馬薩拉

姆」(再見)時,他總是笑著豎起大拇指:「闊依斯!闊依斯!」(好極,好極)。
正如我們在衡陽街頭,遇見一位外國人向我們學說:「謝謝!」或說:「您好嗎?」
那種快樂是一樣的!(〈南窗絮語〉;王琰如,1969:190-191)

至於鍾梅音《海天遊蹤》一如前文所論,作者擅長營造詩化境界,並把自己當成一個人物角色而寫入遊記,將豐沛的情思投注在某種被發明的主體認同之中;最有趣的是,成功的自我虛構化往往融合在敘述之中,不易察覺,讀者因而會認為遊記中的「我」就完全等同於作者本人。三個案例中,徐鍾珮《多少英倫舊事》則將對話體發揮得恰到好處,尤其「英倫歸來」、「倫敦和我」的系列散文,描述之間夾有人物對話,藉此有聲有色地烘托出作者在英國的種種見聞與經歷。例如:

我樓下的太太,有一天來敲我房門,問我是否贊成打開走廊門睡覺。「天哪,我昨天熱得一夜無眠」。她的建議使我吃了一驚,我的回答也使她奇怪,我說:「在我這根本算不了熱,我天天還是蓋著毯子睡覺。」(〈這也算是夏天〉;徐鍾珮,1985:120)

顯而易見,比起間接描述,若將對話適度裁剪進敘述之中,甚至能讓讀者更感身歷其境。不過總體來說,20 世紀中期的台灣女性旅行文學文本主要仍以清晰可辨的作者敘述(the I-narrator)為主流。此外,上述引文同時證明女性旅行文學著重描寫旅程中經驗到的人際交流,以及途中的生活點滴,相關文本的細膩程度甚至直逼民族誌的田野調查紀錄,像是王琰如的《我在利比亞》不僅娓娓道來利比亞的史地背景、奇風異俗,也著墨於一個東方主婦如何依違於異鄉與故土、傳統與現代之間,領著家人發展出新的生活策略與風格。全書充滿家庭生活衣食住行的細節,舉凡對非洲食物飲水的不適應、苦無蔬果豆類等食材以烹調中國菜、摸索著學習製作各種替代或克難食物,到自行為家人理髮、從台灣越洋挾帶生薑最後卻失敗、經過友人介紹而購得「拜公」品牌的殺蟲劑等等,無不入文。利比亞人民的生活習慣、風俗,當地僑社活動、公使動向、駐外人員間的互助情誼,每每也成為王琰如的寫作題材。王琰如雖長期位居文壇幕後、在 1950 年代從事台鐵附屬刊物《暢流》的編輯工作,其文名因而並不如徐鍾珮、鍾梅音來得響亮,但就文學史脈絡而言,《我在利比亞》、《旅非隨筆》堪稱台灣文學史上在三毛之前僅有的非洲書寫。又如《多少英倫舊事》寫戰後物資奇缺的倫敦生活,最是令讀者印象深刻。身為特派記者,徐鍾珮與英國人民一樣必須納入配給行列,她寫排隊上菜場、與肉販交涉的經歷,寫餐桌菜肴之窘迫所見出的人情冷暖,也寫英國人獨特的喝茶文化。藉著描寫她在英國所結識的異邦友人、僱用的外國女傭,歐美文化和西方人的人生觀亦展露無遺。徐鍾珮以友人的笑語自嘲「『英倫歸來』裡全是吃,『倫敦和我』裡全是老太婆。」(〈「英倫歸來」再版自序〉;徐鍾珮,1985:8)卻正好一語道破了女性旅行文學敘事的兩個最大特徵:

生活細節與人際關係。

最後還須補充說明，不同於當代旅行想像的自由無邊、著重個人內在心靈探索，三位女作家對文化傳譯者的身分抱持高度自覺，藉由斡旋在兩種或多種文化及交通模式之間，以驅逐不得其所的不安全感為目標，致力於協商調整的行動，以生產發明他途知識或新的認同。也正是出於如此的自覺，20 世紀中期台灣女作家筆下的旅行文學在馳騁想像之際，整體敘事仍維持相當程度的寫實與報導性質，對 1950 年代以來的抒情散文體系而言，可以說是別開生面的變奏。

五、結語

戰後第一代台灣作家筆下的文本空間橫跨了大陸與台灣兩岸，主要題材包括懷鄉之思、反共意識、日常生活等，除此之外，還有一類旨在介紹海外旅行見聞的文本，對於戒嚴時期受政治、經濟條件等限制而不能自由出境的多數台灣人而言，這些旅行文學所展示的域外新奇事物不僅提供高度的閱讀樂趣，也更是形塑「外國」概念與知識的重要來源，然而，在知性的滿足與文字美學的品賞之外，本文認為「辨『異』與認『同』」實乃女作家域外書寫的重要核心價值之一。

本文首先藉由范登阿比利對旅行結構的辨證，商榷現行台灣旅行文學討論的定義，從而說明 20 世紀中期台灣女作家的旅行文學所呈現的高度回歸性，以及文本對社會文化的反省，此一現象在市場化、資本化的當代台灣文壇是相對少見的，不同於當代旅行文學的個人抒情化傾向，也不像當代某些作者將旅行視為對現實處境的一種逃遁，20 世紀中期台灣女作家的旅行文學清楚體現「家」作為旅行活動的歸著點，它在旅行前後的改變（也可以說是作家經由旅行、而對「家」和原來的文化發生不同的認知），此一重要特徵也解釋了為什麼這批旅行文學在敘寫域外經歷的同時，經常反身自照國內的情形。接下來，本文探討 20 世紀中期台灣女作家的旅行文學如何在國家和性別等身分立場交織的層面上、呈現流動的認同和批判意識，也論辯這些旅行文學如何成功地在戒嚴環境下牟取到更為積極的批判空間，指出文本真正的顛覆之所在。更進一步，本文探討旅行文學文類內蘊的跨越、流動等特質，如何有助女作家暨女性旅行者以書寫再現的方式來開拓女性的時空體驗、發展女性意識，並造就了怎樣獨特的女性旅行敘事手法，而這種著重移動與互動的跨越性，正是上述多重批判視角與認同位置得以形成的內在機制。換句話說，20 世紀中期重要的域外旅行文學皆出自女作家手筆，容或是偶然的巧合，但其實更是文類內在規律與傾向等條件交織發展下的必然。透過女作家的慧心彩筆，旅行文學文本在主客體的重重轉折流變之間，映現了使戒嚴時期台灣讀者深深著迷的「外面的世

界」，然而我們不能或忘其中對社會時事和性別處境的批判，也必須辨析種種別出心裁的敘事策略並非自然天成，而是經過特定選擇安排，有以致之，從而構成一種充滿女性書寫意識與情致的文體特色。

（責任校對：邱比特）

引用書目

一、 中文書目

- 王琰如，1969，《我在利比亞》，台北：三民。
- 朱嘉雯，2003，〈女性散文與流亡書寫：以徐鍾珮、羅蘭為例〉，發表於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之「回顧兩岸五十年文學學術研討會」，11 月 1 日。
- 阮桃園，2000，〈從憂傷到浪漫：現代台灣旅遊文學中的情懷轉折〉，收錄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旅遊文學論文集》，台北：文津，頁 165-181。
- 胡錦媛，2000，〈靜止與遊牧：《印度之旅》中的兩種旅行〉，收錄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旅遊文學論文集》，台北：文津，頁 182-204。
- 胡錦媛，2013，〈返鄉敘事缺席：台灣當代旅行文學〉，《文化越界》，第 1 卷第 9 期，頁 43-74。
- 徐鍾珮，1985，《多少英倫舊事》，台北：時報。
- 張瑞芬，2007，《台灣當代女性散文史論》，台北：麥田。
- 陳室如，2003，〈出發與回歸的辯證：台灣現代旅行書寫研究（1949-2002）〉，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廖炳惠，2002，〈旅行、記憶與認同〉，《當代》，第 57 期，頁 84-91。
- 鄭明嫻，1993，〈一個女作家的中性文體：徐鍾珮作品論〉，收錄於鄭明嫻主編，《當代台灣女性文學論》，台北：時報，頁 311-334。
- 鍾梅音，1966a，《海天遊蹤 第 1 集》，台北：大中華圖書。
- 鍾梅音，1966b，《海天遊蹤 第 2 集》，台北：大中華圖書。
- 蘇碩斌，2014，〈旅行文學之誕生：試論台灣現代觀光社會的觀看與表達〉，《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9 期，頁 255-286。

二、 英文書目

- Bassnett, Susan. (2002). Travel Writing and Gender. In Peter Hulme & Tim Youngs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pp. 225-24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can, Jacques. (1949/1986). 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 as Revealed in Psychoanalytic Experience (Alan Sheridan, Trans.). In H. Adams & L.

- Searle (Eds.),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 (pp. 734-738). 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from *Écrits: A Selection*, pp. 1-7, by A. Sheridan, Ed., 1977, London: Tavistock)
- Smith, Sidonie. (2001). The Logic of Travel and Technologies of Motion. In Sidonie Smith, *Moving Lives: Twentieth-Century Women's Travel Writing* (pp.1-28). Minneapolis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Van Den Abbeele, Georges. (1991). Introduction: The Economy of Travel. In Georges Van Den Abbeele, *Travel as Metaphor: From Montaigne to Rousseau* (pp. xiii-xxx).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Identifying a Local Self from the Foreign Others: Women's Travel Literature in the Mid-20th Century Taiwan

Chang, Yu-ju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ventures to study the mid-20th century travel writing by three women writers, Hsu Chung-pei, Chung Mei-yin, and Wang Yen-ju, under the concept of “the economy of travel” proposed by Georges Van Den Abbeele. In doing so,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women writers open up a relatively democratic space for criticism on social and gender issues under the martial law rule. In order to observe what effects the intrinsic quality of women's travel literature brings to the constitution of literary narrative,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travel experiences and the transition of identity represented in the texts. To sum up, it is not only the intellectuality and prose aesthetic, but also the process of identifying a local and domestic self from the foreign others that defines the significance of women writers' travel literature in the mid-20th century Taiwan.

Keywords: travel literature, identity, Wang Yen-ju, Hsu Chung-pei, Chung Mei-yin